



来到高扬文部长的书房里，我打开事先准备的宣纸册页，递上签字笔。高部长考虑片刻，一笔一划地写了一段话：“祝贺梁家煤矿投产五周年：梁家煤矿，渤海明珠；一日千里，造福一方。高扬文，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

我知道，短短几句话，不仅是高部长对梁家煤矿工作的肯定，也是对矿务局工作的肯定和勉励，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家乡的怀念和祝福。



1992年8月12日，原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视察龙矿集团(时称龙口矿务局)梁家煤矿并题词。于泉城 摄

## 两幅题词中的家乡情

□于泉城

在山东能源鲁西矿业梁家煤矿(原龙口矿业集团梁家煤矿)档案室，保存着我归档的原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的两幅题词。一幅四尺的横幅挂轴，已经装裱；另一幅是写在宣纸册页上的。苍劲有力的字体，彰显了老部长的书法风格。

许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两幅字的来历都与我有一定关系。我不仅是高部长两次题词的见证者，也是第二幅题词的联系人。

1992年，我正在梁家煤矿政工办公室从事宣传干事工作，由于有摄影特长，兼职摄影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每次矿上有什么重大活动，都是我来拍摄。

8月12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矿党委书记韩学安的电话，原国家煤炭工业部高扬文部长要来矿视察，抓紧下楼准备拍照。放下电话，我立刻提起相机、带上胶卷，飞快地跑到办公楼的楼下。

此时，矿长刘元隆、矿党委书记韩学安等矿领导已经在楼下等候。不一会，两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在东办公楼的台阶处停下来。时任龙口矿务局局长李孝省先走下来，随后高扬文部长也下了车。

高部长虽然年过七旬，但是身体硬朗，神采奕奕，步履稳健。我急忙举起相机，抓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局矿领导陪同高部长向楼上的会客室走去。我跟在后面，突然一个念头涌上来：部长来一次不容易，如果能给梁家煤矿题词该多好啊。正好我走在韩书记的后面，便悄悄地向他提出建议，韩书记微笑地点点头，随后他和刘矿长交流了几句。

在会议室，我从几个角度拍摄了高部长与局、矿领导的会场，又给高部长拍摄了几张特写。

这时候，我发现韩书记起身要出去，急忙跟着出来。此时，矿办公室的姜秘书、田秘书正在门前待命，韩书记安排他们抓紧准备场地和笔墨、宣纸，过一会请高部长题词。

我偶尔进去拍几张照片，虽然得到的交谈信息断断续续，还是深深地感受到高部长对龙口矿务局和梁家煤矿的重视和关怀。

高部长对龙口矿务局的高度重视是有原因的。高部长的家乡就是蓬莱，他上学时期就在家乡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参加革命活动。

龙口

矿务局是胶东半岛唯一的煤炭生产基地，矿务局的发展壮大，直接影响到胶东半岛的能源供给，影响到电力行业的发展，影响到烟台市全市经济的发展，高部长因此格外关注。

我父亲于铭钦曾任龙口矿区煤炭生产建设指挥部和龙口矿务局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比较了解龙口矿务局的发展情况。记得他曾跟我说过，高部长在任时，曾多次来龙口矿务局视察调研。

梁家煤矿是1983年12月开工建设的，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海滨煤矿，设计生产能力180万吨，也是矿区煤炭储量最大、煤层最厚、煤质最好的煤矿。由于1983年起国家压缩基建投资，梁家煤矿的建设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但高部长无论在任还是离开煤炭部，都一直关注着龙口矿务局的发展及梁家煤矿的建设，千方百计地解决煤矿发展和建设中的关键难题。就拿首任矿长配备来说吧，刘矿长是从贵州水城矿务局副书记(副厅局级)的位置调到龙口矿务局的，被安排到梁家煤矿担任矿长(副局级)，足以看到矿务局领导对梁家煤矿的重视。

会谈结束后，刘矿长和韩书记几乎同时提出，能否请高部长给梁家煤矿题词作纪念，高部长欣然答应下来。在局、矿领导的陪同下，高部长来到东办公楼三楼的工会办公室大会议室，提笔挥毫，写下了“为梁家煤矿题：主力煤矿要发挥主力军作用！高扬文，九二(年)八月。”我也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珍贵的瞬间。

第二次请高部长题词，是1997年的11月，我已经担任梁家煤矿宣传科副科长一年多。当时梁家煤矿已经投产五周年，安全生产及经济效益蒸蒸日上，矿领导决定将东办公楼的五层会议室改造成展览馆，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2月11日，矿党委副书记周建民将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矿上要办展览馆，我分管牵头，宣传科落实。矿领导决定安排你和矿办公室孙主任去北京和济南，请煤炭部领导和省煤管局主要领导题词，估计省煤管局好办一些，煤炭部领导比较难办，高扬文部长和张宝明、濮洪九两位副部长，至少要保证完成一幅，相信你们能完成此项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和矿办公室孙主任出发了。一路飞奔，傍晚就赶到了北京。

孙主任在车上说：“这次任务艰巨啊。怎么样，能否完成任务？”我说：“靠咱们共同努力来完成，但是高部长那幅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高部长与我们家族有较深的渊源。在1992年高部长来龙口那次，晚上，父亲曾带我去拜访高部长。原来，早年高部长参加“民先”，以及后期参加革命，都是我同宗同族的本家爷爷于眉帮助的。而当年他去蓬莱安香于家找于眉时，是当时担任保长、我的二曾祖父于炳南

(又名光烈，后任村第一任指导员、地下党支部书记)接待的他，将其安排在我的曾祖父

于光济家等候，并联系了于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眉和高扬文都在北京工作，于眉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兼招商局董事长，1980年5月任国家建委副主任；高扬文先后任国家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并在1979年担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正是由于这些关系，高部长一直对我家给予关心和关怀，高部长的夫人李蕴奶奶还将家里的地址和电话都告诉了我，并让我去北京时到他家玩。高部长听说我父亲已经退二线，业余时间重拾书画艺术，非常高兴，还给我父亲题词“大踏步前进”。

11月14日，也是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我拨通高部长家里的电话，女服务员汇报给高部长后，告诉我：“高爷爷让你明天下午3点后来家里。”

高部长当时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前鼓楼苑胡同一个四合院里。第二天，我们刚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的高部长就示意我和孙主任、曲师傅在他对面沙发上坐下。高部长开口就问：“你父亲和家里都好吧？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告诉高部长：“家里都好，谢谢高爷爷挂念。我父亲已经退休，虽然目前全国煤炭行业不景气，但龙口矿务局还能开出工资。”高部长听后很欣慰。

当得知此行是为梁家煤矿题词而来，高部长笑着说：“几年前我题过了。”我说：“是啊，那次是投产前题的，但是投产五年来，成绩斐然，还是请高爷爷再给题一个吧。”在我的央求下，高部长说：“好吧，扶我起来。”

此时，高部长已经八十周岁，行走起来较前几年明显不便。来到高部长的书房里，我打开事先准备的宣纸册页，递上签字笔。高部长考虑片刻，一笔一划地写了一段话：“祝贺梁家煤矿投产五周年：梁家煤矿，渤海明珠；一日千里，造福一方。高扬文，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

我知道，短短几句话，不仅是高部长对梁家煤矿工作的肯定，也是对矿务局工作的肯定和勉励，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家乡的怀念和祝福。

交谈中，高部长对我说：“很想念于眉，我们既是战友又是好朋友，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高部长还嘱托我：“抽时间收集些资料，写一本反映于眉革命事迹的图书，我和交通部的陶琦都可以提供纪念他的文章，如果资金有困难，我来解决。”高部长的一席话，令我感动万分，这是多么可贵的战友情谊啊。又谈了约十分钟，为了不影响高部长的休息，我们离开了他家。

在北京期间，在我和孙主任的共同努力及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还得到了时任煤炭工业部张宝明副部长、濮洪九副部长的题词。返回时路过济南，又得到了山东煤管局两位主要领导的题词，可谓一路平安，事事顺利，圆满完成了领导安排的任务，得到了矿党政领导的表扬。

如今，高扬文部长已经去世20年了，我经常想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也常常想起他的题词。题词中有故事，题词中有情怀，更有那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龙口有着悠久的历史。莱山脚下的“归城”故城，“月主祠”古迹，是秦始皇东巡龙口时，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加吉鱼”，因为此鱼有长寿美颜的功能，寓意着“双喜”和“吉上加吉”的意思，所以，龙口人办婚事，必上的一道菜就是“加吉鱼”，同时，也为了证明是“双喜临门”，结婚这天，来宾必须吃“两道饭”才能达到喜庆的氛围，也是历史的一种传承吧。

“龙口”这个名字的来源，与当地的地形有关。市区南面，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条蜿蜒飞奔的巨龙；而从山上曲折折向大海的河流在入海处形成的河岔，正是巨龙的口；万顷碧波之上，与陆地相接壤的妃姆岛，则是传说中的“龙头”。这条巨龙往来于山岭和大海之间，多么神奇！在这里，乡村的民俗婚礼，也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龙口的乡村民俗婚礼，首先是择吉日。人们大都选择在农历三、六、九日举行婚礼，而且多集中于新年后和春节前。一是从传统习俗上讲，“三、六、九”伴着吉运走；二是新年到春节正是农闲季节；三是时令是隆冬，为婚礼宴席准备的食品不会变质，易于保存。

新人订婚后，要在结婚前由新郎和新娘家分别举行请媳妇和请女婿的仪式，也就是分别召集自己家的亲朋好友聚集到一起吃顿喜酒。以前条件差，大家都在自己家里请客，现在条件好了就到酒店请客。

确定吉日后，便是过彩礼。龙口乡村送彩礼，一般也看家庭条件，从3.8万元、6.6万元到8.8万元不等，而娘家回礼也会在礼金范围内。总之，就是带有六六大顺、八八必发的意思。彩礼送到后，双方的契约关系就正式确定了。然后便是送请帖，通知亲朋好友。对一般亲朋好友只用单帖，对女方的长辈如祖父母、父母、叔伯等人的请帖，却是别具一格的，要用单帖的红纸折叠成八等份，俗称“八折帖”，以表示对女方重要亲人与客人的重视。

到了良辰吉日迎亲时，新娘家要准备馒头、镜子、脸盆等物品，这些要新娘亲手包好，然后由伴娘拿着到新郎家。而新郎出门前，首先要由新郎的父亲铺床，接着要由2个小孩滚床，当然滚床的小孩是少不了红包的。新郎出门前，要吃一种夹着菜的喜饼，意思是以后有了媳妇，就是吃糠咽菜也要有喜庆的感觉。

在龙口迎新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就是新郎上车前，必有一位男方家德高望重之人，在胳膊上挂上一块红毡，当地叫“夹毡”，其目的是“避邪”，就是遇到比如丧事、车祸等不好的事情时，由“夹毡”者打开这块红毡，挡住新郎新娘的视线，避免不好的“视觉”影响了喜庆的氛围。

新娘的伴娘团一般不少于两人，而且必须是未婚姑娘，当伴娘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如果超过三次，民间认为会不利于新郎新娘的幸福，也不利于伴娘以后出嫁。而伴郎就没有这么多讲究了。

新娘出娘家门前，新娘的母亲要亲手将面条喂到新娘的口中，同时，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要双手拿红线为新娘开道，寓意着“爱情线”长治久安。迎新当天，新娘家还要为接亲的新郎、伴郎、司机、“夹毡”等人，备上一桌子酒菜，请他们象征性喝上一口。新郎则要在屋内“费尽周折”找到新娘的鞋并为新娘穿上。新娘到了新家后，要在新房内踩着小凳子上床，寓意着步步登高。之后，新娘要将窗户上的窗帘和红纸打开，寓意开启新生活。

在乡村婚礼上，龙口与众不同的是，从上午9点开始，每一位来参加婚礼的嘉宾，不论上午几点到场，都要先吃一碗“喜面”，就是“第一道饭”。因为有的人为准时来到现场参加婚礼，早早就从家里出来，顾不上吃早饭，乡村婚礼的主人考虑到这一点，便请师傅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让客人随到随吃。面热气更香。一碗小面传递出的“美好的生活味道”，既表达了主人的谢意，又照顾了客人的需求。

大家边吃拉面，边欣赏着村民组织的原创歌舞、小曲小调，内心在发出祝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到了下午2时，“第二道饭”婚礼喜宴才正式开始，几个农村大厨在这里准备了鸡、肉、海鲜、水果捞、炖排骨等十多道乡土气息的美食，虽然没有大酒店的精美，没有大酒店的高档，但原汁原味的农家菜，也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回味无穷。

喜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是“加吉鱼”。加吉鱼的另外一个名字是鲷鱼，《烟台水产志》中记载：“因鱼名贵，是上等人必食之物，又固体色艳红是吉庆之意，故名甲级，宴席上有它可代替鸡，故又称鸡。”而在老福山县志和牟平县志当中，它又被写作“鱼加鳞”“加级”“嘉鳞”，字虽然不太一样，但读音都差不多，后来演化统一为加吉鱼，寓意颇佳。加吉鱼虽然名贵，但因为寓意好且味道美，它逐渐成为宴席上的“压轴鱼”，所以，这道菜成了乡村菜谱的点必点。

乡村的菜品，虽不敢说道道是精品佳肴，但每道都饱含着山里人的淳朴与热情。“二道饭”吃的是亲情，体会到的是真诚与友情，满载着乡里乡亲的祝福。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平淡的，在婚后漫长的岁月里，牵了手的人，在激情过后，都会面对平平淡淡，或许还会有些磕磕绊绊，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新郎新娘能在平淡中创造出绚丽多彩的生活，记住自己的乡愁，能在平淡中找到自己的快乐，这就是幸福！

婚礼后的第二天，女方的父母或叔、伯到男家同亲家会面，谓之“会亲家”，要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陪席的，多是村里的名人或长辈，他们谈吐文雅、举止不凡，既给男家装潢了门面，又给对方一个极好的印象。

如今，龙口莱山脚下的乡村婚礼，不仅情味很浓，而且简约不简单，比起豪华酒店的婚礼，多了一份韵味、多了一份乡情。婚礼倡导勤俭节约、理性健康，摒弃商业模式，向外界展示了大美龙口莱山的和谐友好和人文关怀。愿这样的婚礼常与我们见面。

□白晓光

## 儿时的庙会

□陆玉生



如今的庙会依然是男女老少的最爱。

杨春娜 摄

小时候，我老家(蓬莱与黄县交界处的于庄乡)一年中有两个庙会，一个是“二月二土地庙会”，另一个是“三月二十八天齐庙会”。我记事的时候，蓬莱、黄县一带已没有庙了，只有集市，庙在“文革”时期被拆毁了。由于一年中只有两次庙会的机会，所以生活枯燥的庄稼人和孩子们都很珍惜，赶会时情绪高涨，空旷地兴奋。大人在好多天前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孩子们更是连做梦都盼着。小时候感觉天齐庙会虽然规模大，但没什么特色，所以除了人山人海的场面，再没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二月二的庙会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二月二龙抬头，我们这儿的男人不论老少，在庙会前是必须理发的，谁不理发，就意味着一年抬不起头来，诸事不顺。再是，我们这儿的人迷信地认为，二月二这天的天气管一年的收成。二月二早晨，父亲天不亮就会起床到外面看天气，如果看到的是云淡风轻、星光灿烂，父亲就会高兴地大声说：“好兆头啊，今年景准不会错！”如果看到的是晦气的天气，父亲就心事重重的不景气了，然后点上一袋烟慢慢吧嗒。二月二早晨，我们这儿还有“打灰地”的做法，就是每家的

男人要早早起床，用铁锨铲了草木灰在院子中画粮食囤子。画大、中、小三个圆圈，套起来为一个囤子。一般一家院中要画两个囤子，一个盛粗粮，一个盛细粮。盛粗粮的囤中央要放一把玉米粒，盛细粮的囤中央要放一把麦粒。我家的院中，父亲除了画囤子，还要画上梯子，象征粮囤子高，五谷丰登。父亲画的囤子很大很圆，每个圆圈都线条均匀，梯子也画得很像那么回事。有一年我淘气，从父亲手里抢过铁锨画囤子。由于我个子矮、胳膊短，不能像父亲那样站在原地转圈画，而是端着铁锨跑着画，最后把囤子画成一个丑陋的椭圆形，收口处还凸出一个大圆弧。父亲看了正要发火，母亲却从里屋走出来说：“今年咱家年景一定好，你看，粮食都把囤子胀歪了。”父亲听了转怒为喜，说：“对，说得对。孩子，放鞭去！”于是，我和父亲就挑起那挂提前准备好的大鞭到门口放了，然后放爆竹。放完鞭炮，母亲就把准备赶会的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

在我上三年级的那一年，上级来了指示，说是农民要抓紧整大寨田，不放工赶会了；又说庙会是滋生投机倒把的土壤，易使人思想变坏，要铲除。学生也不让放假了。那一年我的心情特别郁闷，别的孩子也一样，我们觉得好像太阳也不亮了，天也不蓝了，一切都变得没趣了。不过，那样的情景只有两年，以后又让赶会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总忘不了儿时赶庙会的那些趣事。



悠悠往事